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

总主编 张岱年 石 翔

中国处世文化名著

主 编 姜玉山 吕庆业

中国

011443

文化经典名著大系

张岱年 石 翔

总主编

中国处世文化名著

吕庆业 伍振忠 主 编

高振友 吕 岗 副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光呈

封面设计:尹怀远

版式设计:全明波

中国处事文化名著

姜玉山 吕庆业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字数:501千字 印数:1—2,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0785-5/I·60

定价:32.90元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总序

张岱年 石 翔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学术思想空前发展的兴盛局面，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其后二千年来，虽然朝代兴替，世事沧桑，但中华文化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虽然也曾经过曲折，然而总体趋势却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许多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断涌现和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的屡屡诞生，便是使中华文化卓立于人类文明史的明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背景下，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思想的渗透和浸润更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思想铸造了国人的灵魂，培育

了民族性格。

《论语》原是儒家先师孔子的一部言行录，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崇；汉代以后，从蒙童的诵读开始，成了读书人的“圣经”；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注释之后，便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教科书。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论语》的生命力仍然不衰；就是到了现代，《论语》的发行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一版再版仍然是惊人的。其中的名句，仍然在印刷品里大量被引用。

何止《论语》如此，在中华文化灿烂的园地里，其它思想体系经过历史的考验与筛选，也各领风骚，连峰叠起。道家学说，至今仍使超然者愉悦；孙子兵法，千秋传诵；佛禅之道，信奉者不乏其众，秦汉之前就已吹响的要求变革的号角，一直或高亢或暗哑地回响在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我们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把中华文化推向了新的时代，变革思想对民族的觉醒与前进产生了巨大作用……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文化的巨大影响力，都在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也感召着每一代人奋然前进。

思想文化与民族灵魂、民族性格的关系即然如此密切，自然引发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到底哪些书、哪些思想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最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最能渗入人们灵魂，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性格呢？1923年胡适之撰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亦撰写了《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等等。这些书目，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

参考。《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也是为对此有兴趣的学人比较集中地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意见。

延边大学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从塑造民族灵魂与性格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在浩如烟海的名著中，将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著作或全集或选其要按儒、道、佛、兵、法和神秘文化、性文化、帝王文化、处世文化、革新文化十大类别，集中编纂，加以作者简介、注释与简析，呈现给广大读者。这样分类，当然只是相对的，各卷之间有些交叉是难免的，命题也不一定都那么准确。例如“神秘文化”，近年来此类图书的出版虽然屡见不鲜，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界定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其中一些著作，宣扬迷信等消极层面如何加以分析与剔除，还有待于进一步进行讨论。然而考虑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此类著作在坊间的较大生命力与民间现实生活中的一定影响，在舍与存的选择上，还是以保留为较完整。再如“帝王文化”，本是政治文化之一种，其内容虽然大都是关于封建专制统治者治国御人之道的，然而它们的认识价值与经过分析之后的借鉴作用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如此等等。每卷书之前均有该卷主编撰写的导言，对上述之问题有一定的分析，请读者留意之。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将是人类更加文明的新起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理所当然要为此做出新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并分析中华民族灵魂与性格形成的渊源与脉络，对其精华部分发扬光

大，对于束缚我们民族前进的糟粕部分加以批判并摒弃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武装自己，放下包袱，重铸民族魂，再塑民族性格，大踏步地前进，从而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绵亘的山系，其宏富、深邃与复杂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态，随着历史的推衍，自身也经历着一个发生、发展、碰撞、转变的过程。它对国人灵魂的影响与铸造更是复杂而多变的。它与历代统治者强化灌输、学者文人著作的感召与感染、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等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的编选主旨与方法，包括它所划分的类别、每一类别所选列的名著、对名著的注释与解析等等，当然只能是一种尝试，因为这是一项既有意义又相当困难的工作，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指导与批评。

1995 年 11 月

目 录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名著经典大系》总序

..... 张岱年	石 翔	1
导论	吕庆业	1
《论语》(节选)	孔 丘	11
《庄子》(节选)	庄 周	37
《荀子》(节选)	荀 况	67
《孝经》		96
《礼记》(节选)		111
《新书》(节选)	贾 谊	134
《潜夫论》(节选)	王 符	157
《颜氏家训》(节选)	颜之推	206
《家范》	司马光	253
《放翁家训》	陆 游	334
《官箴》	吕本中	344
《袁氏世范》	袁 采	352
《三事忠告》	张养浩	417
《菜根谭》	洪应明	466

《潜书》(节选)	唐 甄 532
《曾文正公家书》(节选)	曾国藩 577

导 论

吕庆业

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也具有深邃优秀的文化传统。而处世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不能代替的，实际上也是代替不了的。

“处世”作为哲学命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最为致力探讨的课题之一。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哲人们对处世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精辟的分析，生动的阐述。这些著述，以其完备的体系和深刻的理论著称于世，成为我国乃至今世界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处世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人生的问题，属于哲学中的人生论。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对此有过极为精湛的论述，例如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接触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他认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见《中国哲学大纲》）张先生的阐释可谓深刻、得体，代表了当代哲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由于哲学思想的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对待如何处世的问题上，不同的学派各有自己的看法。择其大端

而言，儒家主张入世，态度是积极的。道家主张避世，态度是消极的；佛家主张出世，态度则更为消极。这些思想对后代都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宋明以后，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创立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被后世视为不足法，“五四运动”以后，更遭到了人们猛烈的抨击。

儒家和道家的政治主张不同，因而对处世的见解也各异，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但这两家的经典学说，则始终成为我国古代世人处世的基本依据。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时有人独钟一家，有时有人兼采两说，但终究没有离一儒家和道家的基本的处世思想。下面分别就儒、道两家的处世主张，做一简要的回顾和概述，以见其源与流。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部《论语》道尽了关于人生与处世的哲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和正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处世即处人。人生在社会中，长于人群里，个人与整个社会，与周围的人群，有着鱼水般的依存关系。一切理想、愿望、目标，都要通过处理好和解决好这一关系，才能圆满地实现。孔子深谙个中三昧，在待人处世上，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把“仁”作为人生处世的最高准则，要人们尊奉这自古以来的行为标准，以合和调顺为处世的前提，以礼义为做人的依据。“仁”字由“人”和“二”两个字会意而成，愿意是指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孔子正是采取这个意义，把“仁”作为处理人我关系的道德准则，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孔子对“仁”的基本理解就是博爱，他说：“仁者爱人”。“爱人”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爱”，要有怜悯心、同情心、恻隐之心，安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

尊重。从消极方面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方面说，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实行忠恕之道。

儒家以仁义为根本，后世概括为“孔曰取仁，孟曰取义。”孔子认为要达到仁和义的境界，具体说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热心救世。

孔子在《论语》中，告诉人们的处世原则是积极的入世，而不是消极的避世或出世。孔子一生就是恪守自己制定的这一处世哲学的。在天下动乱的春秋末生，孔子不是遁迹山林，隐逸避乱，而是多方奔走，四处游说，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匆忙奔波的旅途中，遇见了不少远离世事的隐士，他们对孔子汲汲于世事，或感到不解，或冷嘲热讽，或不予理睬。孔子的回答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表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且积极参预改变社会的活动。他是明“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坚不拔的救世精神，为后人关心世事、积极入世，树立了良好榜样。

立志自强。

孔子强调“尚志”，认为人要有志气，自自强、自信、自立，要奋发有为。他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要求人要自信、自立，要有生活的本领和能力。他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孔子的这些言论和他自身的做法，都强调人要有志向，并要培养实现志向的能力。

修身利他。

儒家的处世哲学，对于社会来说，是爱人利他；对于自己来说，是正己修身。孔子认为己不正则难以正人，首先要求自己奉行社会通告的道德准则，加强自身的修养，经常省察自己。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他哟调严于律己，宽以责人，说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待他人，孔

子采取利他主义和宽容的态度，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就是尽心竭力，不只是对国、对君，对一切人都应如此。孔子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

娄乐道贫。

孔子对处世的要求是达到乐道安贫的境界，他不仅要求一个人的行为能合于“仁”道，而且要把“仁”道做为自己的爱好、追求与信仰。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本人就是个“乐以忘忧”的人。只要心中有“道”，居陋巷亦不改其乐。他提倡“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里告诫人们，做人要清白正直，不被利禄富贵所诱惑，不追求物质享受，不计较贫贱卑微，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沉浸在“道”中，从而培养出高尚的情操。

知人择友。

处世必先知人。在社会中生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首先要知人，即了解人。若知人，须从知言入手。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在了解人的时候，不仅要“听其言”，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孔子还十分重视择友，他认为直友可以辅仁益友可以进德，损友则足以损德，交友则不可不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语》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待人处世的百科全书，人世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除上述简要地介绍的几点之外，关于父母之慈、子女之孝、兄弟之友、夫妇之爱、朋友之信以及立信、中庸、躬行、守礼、好学、改过、推己及人、慎言敏行等方方面面都有所论及。这些内容不仅成为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公行的是非尺度，也几乎成为后世人们所尊奉的信条，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二

后世的儒家学者，虽然一般没有超出孔子倡导的境域，但是在对孔子学说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使儒家的处世思想更为丰富和明确，更加系统化。

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根据战国时代的特点，关于处世哲学，在孔子讲“仁”的基础上，更注意的是“仁义”并重。在本“大系”的“儒家文化中”，对孟子有颇详的论说，本卷未选《孟子》原文，故不论及。

荀况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孔孟学说的同时，有了更多的发展，内容更加具体，也更切合时宜。他认为“仁义”是立身之本，是处世的原则之一。人不可图名利去做“难能可贵的事，在“仁义”面前，宁遭世俗非议，也不可退让。他还提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认为“诚”是实现“仁义”的要领，是“养心”的门径。只要做到了真诚，就没有其他可做的了。荀子告诫人们在处世之时要善于权衡取舍，这样可以免遭耻辱和伤害。他还主张正确对待荣辱。光荣和耻辱的最大界限是：正义在先而私利在后的，光荣；私利在先而正义在后的，耻辱。《荀子》中的有些篇章，还具体地分析了处世之术；地位高贵，而不表现奢侈；受到信任，而不处嫌隙之间；责任重大，而不敢擅自专主；财利到来，要感到自己的善行好像不应该获得；福事到来，要和悦地去处理；祸事临头，要镇静地去对待；富裕了要广泛布施；贫困了就节约用度。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也可以处贫，等等。

迨及汉代，二戴把战国秦汉间的儒家言论，汇集成《礼记》一书。其中有关于具体的礼仪制度的记述和阐发，体现了我国古代传统的礼仪文化、生活规范和处世哲学。它以礼乐为核心，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精神观念为根本。《礼记》中，《中庸》、《大学》两篇，对儒家的处世思想阐述得最为详尽，对后

世的影响也最大。早在唐代，韩愈、李翱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就对其十分推崇。到了南宋时期，朱熹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庸之道为孔子首创，而《大学》、《中庸》两篇，对其做了充分的阐发，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所谓“三纲领”是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使儒家的人生修养、处世哲学完成了系统而完整的体系。

西汉初期，贾谊曾一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他的政论集《新书》，有些篇章反映了他的处世思想。这些思想与儒家学说一脉相承。他认为要把世事处理好，把人际关系搞好，首先要了解社会，了解事物的变化。他主张知恩必报，投桃报李。他引用古谚“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来说明他的认识。他还强调儒家一贯宣扬的“报怨以德”的思想，并通过一个生动的小故事阐述其中的道理。楚国边亭毁坏了梁国边亭的瓜田，梁大夫宋就却让士兵在夜间去浇灌楚亭的瓜田，而不是以怨报怨。其结果则是缓和了楚、梁两国的矛盾。

东汉王符的《潜夫论》认为，处世之要在进德修业，这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也是为了显扬父母。他还提出了“遇利”的主张，尤其不能见利忘义。对尊荣和卑微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身居宠位不要自以为了尊，傲视他人；身居卑位也不要自以为鄙，妄自菲薄，要做到宏辱不惊，泰然处之。

平民有平民的处世问题，官员有官员的处世之道。南宋吕本中的《官箴》则是专为官员们写的，他所讲的为官之道，可用三这个概括，即清、慎、勤。具体而论，则是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与人争，能少自忍；沉思静虑，心诚尽职。为官要能做到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元代张养浩所写的《三事忠告》，也是针对为官者而发，也可用三个字概括“忠、敬、仁，即忠以事上，敬

以持情形，仁以恤民。这是儒家的处世哲学在官场上的具体运用。

三

道家的处世哲学在《老子》一书中有精到的论述，充满了关于人生和处世的辩证法，强调顺其自然地对待人世，就如同种庄稼一样，依循事物变化生长的原则，不勉强助长。老子的哲学在本“大系”道家文化中有详尽的论说，这里不详述。

庄子及后世的道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处世理论。《庄子》一书，运用大量的寓言，对老子的学说做了生动形象的阐述。他以“无为”为津梁，强调处世应以“养生”为急务，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如此，这个社会也就越来越难处了。已经在追求智慧的人，也只能在难处的境地处世了。他提出的处世之道是：做别人喜欢的事，且勿追逐名利；做别人反对的事，且勿触及刑罚。避开名利与刑罚，就可以保全身体，存养生机，蓄蕴精气，尽其天年。这种主张是要人们看破功名利禄，能摆脱它们对精神的束缚，使精神活动达到逍遥自在的境界。要划定自我与外物的界限，明确荣辱之间的分别，不因举世赞誉而忘形，也不因举世责难而沮丧。精神的自由须要生命的畅达，须要追求人的天性。修养身心并达到天性自然的境地，人的生命才可以健全、充足。健全充足的生命与自然合为一体，便可以使精神达到高度的凝聚，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老庄思想的核心是“无为”，其具体表现则是无名、无功、无己。他认为一个人应当破除自我中心，不需要任何依赖和凭借，摆脱任何条件的制约和束缚，与大自然化而为一，达到无我的境界。若此，则无往不逍遥，随遇能自安。“无为”并不是庄子追求的终

极目的。其终极目的在于“达生”，即使生命达到一个充分健全的境界。为了“达生”则要“养生”，庄子提出的养生之道，就是顺序自然，通俗地说，就是把钻空子当作为人处世的基本法则，要像庖丁解牛一样，专找空隙之处进刀，避开一切矛盾，方能游刃有余。

唐甄的《潜书》就其总的内容来说，倡导仁义属于儒家学派，但他反对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中也有许多道家的东西。比如，他主张养心除欲，认为“欲为乱根”，天下的扰乱不安，皆由私欲膨胀引起的，必须摒除私欲，他说：“为学之道，制欲在先。”他还主张顺时而隐，不过他反对那种“乱不出，治亦不出”的做法。

洪应明的《菜根谭》熔儒、释、道于一炉，这与他是隐居村野的布衣身份有关。他看破红尘，淡泊名利，把名和利看成镜花水月、空中楼阁，恬于进越，耻于追求。

古人在命运通达时，往往用儒家的处世哲学修身治国，大展鸿图；际遇困窘时，往往以道家的处世分法息志保身，安慰自己。唐甄和洪应明就两者兼而有之。

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在中国古代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林立的时候，处理好家庭关系尤为重要。因而在古代就特别重视治家，把治家看成是处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因而以《孝经》为首，继《颜氏家训》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以家训、家教为内容的著作。

儒家学派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德行不足以影响他的家庭，也就无法教化他人。从政的人，具备了君子的美德，不出家门，便可以达到感化民众的目的。懂得孝顺父母的道理，便可以侍奉君主；懂得慈爱儿女的道理，便可以统治百姓；懂得敬畏兄长的道